

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与可持续发展

沈坤荣

一、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经济

快速的经济增长是每个国家都渴求的目标,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情况尤为如此。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也不例外,而且对增长目标的渴求还表现得十分强烈。我国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已迈过了几个关键阶段,经济学家们所期望的自我持续的经济增长(Self-Sustained-growth)机制已开始形成。笔者借用H·钱纳里等人的多国模型分析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其中最重要的变量是人均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结构、就业结构、消费结构和城市化水平。^①

1. 人均国民收入。到1994年(按当年价格计算)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3679元;按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则为1353元;按1978年汇率(年均168.36)折算人均收入则为803.7美元。比照H·钱纳里等人的多国模型,我国经济发展已走完了工业化前准备阶段的路程,跨进了工业化实现和经济高速增长的门槛,并且已发展到了实现工业化的起步时期与工业化发展加速度时期的交界区间,即从560美元到1120美元(1970年美元)的加速度增长时期。^②

2. GNP结构。由于我国自1956年以来,直到1978年为止,一直实行“逆霍夫曼定理”战略,GNP结构呈现出完全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第二产业超前发展、制造业产值的比重过高的情况。1978年以后,市场化进程的改革虽然使上述情况有所改变,但是,一、二、三次产业国民生产总值占全社会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仍分别为21.0%、47.3%、31.8%。第二产业以及其中的工业所占比重不仅远远高于所有低收入国家,而且也超过了绝大部分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据此看来,似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工业化后的稳定增长阶段,或者说进到了H·钱纳里多国模型的第4个时期^③。然而,由于农业份额仍然偏高,服务业份额偏低,因此,作为这种高估的根据乃嫌不足。如果仔细观察我国近年来的产业结构变动,不难发现,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尚未最后完成,产业结构高级化(第三产业对增长的贡献率上升,第二产业普遍采用更高级的新技术)的潜能正处于酝酿阶段,产业结构变动的本质飞跃正处于来临的前夜。据此判定,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尚未跨进实现工业化的第三个时期,而是处于这一时期的临界点上。

3. 就业结构。1978年我国三次产业就业构成分别为70.5%、17.4%、12.1%。到1994年已分别发展成54.3%、22.7%、23.0%。尽管就业结构变动率,特别是一、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变动率较大,其中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下降16.2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上升5.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上升10.9个百分点^④,但是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仍然偏高,它表明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余地还很大,第二产业所能提供支持第一产业劳动力向第二、特别是第三产业转移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还很低。由此判断,我国经济发展目前仍处于实现工业化的起步时期向加速度时期转变的阶段。

4. 消费结构。消费结构是生产和分配关系以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综合反映。一般地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反映消费结构变动的恩格尔系数就越低。1994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生活

费收入为 3179 元,人均食品支出 1422.9 元,恩格尔系数为 0.45;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为 1221.0 元,人均食品支出 598.47 元,恩格尔系数为 0.49。二者平均,已接近人均收入达到 560 美元(1970 年美元)的水平。

5. 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占社会总人口的比例是城市化水平的基本标志。而城市化水平又是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另一个综合反映。据世界银行《1994 年世界发展报告》统计,到 1992 年,全世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42%,其中中等收入国家的城市人口比重为 62%。根据我国国家统计局统计,1994 年我国市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仅为 28.62%。当然,由于统计口径不一致,我国城市人口比重有低估的可能。有人主张依户籍为准进行统计,笔者认为,户籍或商品粮关系是传统集权体制的产物,并不能完全反映实际情况,最能反映实际情况的依据应是人口长期生活地。例如,常住深圳的数十万“打工妹”,按户籍关系虽不属城市人口,而按常住关系就应算是城市人口。估计目前全国农民进城做工的占总人口的比例有 10%左右,据此推算,目前我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可能为 38%左右,仍低于世界水平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由此又表明,我国经济发展还处于较低层次和较低阶段,工业化的任务还远未完成。

总之,我国目前既非处于经济发展的工业化准备阶段,也非处于经济发展的工业化后稳定增长阶段。而是处于经济发展的实现工业化和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按照罗斯托的经济起飞理论,这一阶段既要求对传统社会进行大量先行的改革,为起飞创造条件。同时,在这一阶段国民生产又有一个加速趋势,人均国民收入总值从 300 美元走向 2000 美元,经济向自我持续增长阶段推进。

二、我国经济增长的粗放型特征

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反映经济增长主要特征的经济增长方式(或模式)也将随之发生变化。经济学家常常根据不同的标准来划分:各个国家或者某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经济增长方式。在这些标准中,最为常用的标准是依据经济增长中的诸要素的贡献份额来划分,它是现代经济学的生产函数及相应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理论为基础的。根据这一理论的分析,构成一国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有两类因素,其一是要素投入(包括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的增加,其二是效益(即综合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一国经济增长中,如果要素投入的贡献大于效益提高的贡献,那么该国经济增长是粗放型的,即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反之,如果效益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要素投入的贡献,则为集约型或效益型经济增长方式。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中要素投入的贡献份额远远大于效益提高的贡献份额,综合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非常缓慢,即使在改革时期,综合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仅为 25%,90 年代以来也只有 33.1%,这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我国经济高速低效增长的粗放型特征,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1. 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的步伐缓慢。一是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最薄弱的环节,水利建设和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尚不充分,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脆弱。在广大农村,道路建设、农用电力和农用机械化的程度仍有待大幅度提高。二是“夕阳产业”转产不利,新兴产业对相关产业带动能力不足。重复投资与生产能力过剩并存,导致了产品库存积压和“三多三少”的现象,即大路产品多、名优产品少;低档粗加工产品多、高附加值深加工产品少;平销产品多、畅销产品少。三是部分企业因受原材料、能源、运输等生产要素制约,正常生产经营受到影响。

2. 一些适宜社会化大生产,要通过规模出效益的产业,如汽车制造、钢铁、机械、电子、石油化工等行业的经济规模状况不容乐观。对于这些产业而言,实现经济规模是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取得良好经济效益的前提。而我国的这些产业普遍存在产业集中度低和专业化水平低的现象。以汽车制造业为例,目前,国际上汽车制造企业的最小有效经济规模是年产汽车40—60万辆。在我国年产超过10万辆的只有一汽、二汽和上海大众三家,因此达不到最小有效经济规模的要求,国产汽车价格居高难下。在机械、钢铁、电子、石化等行业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3. 投资的技术含量呈下降趋势。从经济发展史看,技术构成的提高在经济增长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新增投资中,技术含量应有不断增加的趋势。所谓投资增量中的技术含量是指用于购置技术设备和工器具的资金占全部新增投资总额的比重,是反映投资效益的重要指标。据统计,1986年我国投资中的技术含量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7.26%,1993年下降到25.24%;整个“七五”期间是26.66%，“八五”期间为25.86%。这表明近些年来,我国投资中的技术含量出现下降趋势。这对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后劲,对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是相当不利的。

4. 企业管理质量不高,缺乏竞争意识,资源浪费严重。有相当一批企业忽视内部管理,有些企业领导人素质差;有些企业规章制度空洞,管理无章可循,从而导致了亏损现象大量发生。由于企业管理质量不高,使工业经济总体效益低下。1995年上半年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为87.68%,比上年同期下降3.81个百分点,工业资金利税率和成本费用利润率分别比上年下降1.45和1.12个百分点。百元资金投入创利税竟低于银行贷款利息。

5. 缺乏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由于我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间不长,这方面的经验仍然不足。一是在经济发展速度上还难以杜绝大起大落的现象,经济波动的周期性相当明显。二是在经济波动的同时,物价也呈波动状况,有些年份物价涨幅过高。三是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必须紧缩银根,而紧缩银根又造成企业的流动资金紧张,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这已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矛盾。

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上述问题与我国经济增长所处的阶段极不适应。因为,在粗放型经济增长中,要保持高速增长,就必须快速而大量地投入各种生产要素,但由于经济效益较低,过多的投资会引起需求过度,从而导致需求过度型短缺与通货膨胀。因此,这样的增长局面不能长久维持,最终会因各种矛盾激化而被迫放慢发展速度。相反,如果是效益型经济增长,即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大于要素投入增加的速度,那么,只要不超过社会总生产要素的容量,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同样有效的,而且这将使社会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长期以来,我们在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问题上总存在分歧。一些人认为增长保持高速度并不好,甚至有的视之如洪水猛兽,并把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几次大的波折归咎于追求高速度。对此我们应该作具体分析。因为假若我国经济是建立在效益型基础之上的高速增长,那将会大大促进社会财富的增加,而且还应该保持一定的高速度才能充分利用各种生产要素。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速度的高低,而在于经济增长的方式。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国民经济走的是粗放型增长方式,这就已经规定了它的速度不能过高。因此,控制速度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根本的出路在于重新选择增长方式,即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三、转变增长方式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是“九五”期间乃至今后15年我国经济

能否由起飞进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从根本上来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赖于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深化,即通过改革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能耗、增加效益的企业经营机制,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具体来说,应该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 处理好国力和发展的关系,从长远利益着想,实行稳定增长的宏观政策。我国经济发展处于起飞阶段,整体经济的落后性给我们一种压力,必须迅速赶上去。但经济发展多快,总要有个度,这个度就是经济发展快到什么程度才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才不致引起社会的不稳定。而只有把宏观经济的增长建立在效益、结构、速度相统一的基础上,才能切实增强国民经济发展的有效性、持续性和稳定性。从我国的发展阶段和现实国情来看,“九五”期间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要控制在8-9%以内,年度增长速度一般不能超过10%,这个增长速度在国际上已属于少有的高速增长,但在我国现阶段大体属于能够实现的适度增长。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这个水平,就会出现效益下降、质量波动和结构失衡,并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从而使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再度落空。

2. 重视农业的发展。增加农业投入,加强大型水利工程建设和农田水利建设,逐年增加灌溉面积,增强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重视和加强农村道路的建设,提高农用电力和农民机械的使用总量和普及程度。加强农田的精耕细作,保护农民种粮、种棉积极性,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为工业产品开辟广阔的农村市场。进一步支持、鼓励、引导和管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

3. 大力增加科技投入,不断提高科技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份额。与发达国家的科技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相比,我国不到1%,结果难免是科技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另外,在国际贸易中必须坚持“以市场换技术”而不是“以市场换资金”。因为外商看好中国,除了我们的廉价劳动力和廉价土地外,长远考虑是垂青于我国12亿人口的大市场。因此,我们应该把技术贸易放到进出口的中心位置上来。

4. 优化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坚持面向国内外市场,引导企业按照市场需求组织生产。运用国家掌握的资金、运力、能源、原材料支持新兴产业,支持适销对路、效益好的企业和短线产品生产,对长期产品积压、污染环境的产品实行限产转产。充分发挥市场优胜劣汰的作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通过兼并、重组,促进工业投资相对集中,加快对整个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生产布局 and 地区结构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

5. 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步伐。国有企业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主要因素,其根本原因在于企业制度变革滞后。虽然由于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产权制度改革的涉及面广、影响性大,近期可以先从加快政企分开、提高企业经营管理和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做较大努力,但需要明确的是,这几个方面实际上都是与产权问题联系的,如果不尽快通过推进国有产权制度改革去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效益低下的局面难以真正改观。因此,尽快推进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就成为加快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注:

①部分数据引自《中国统计年鉴(1995)》、《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

②③H·钱纳里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

④《中国统计年鉴(1995)》第83页。